

不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路径的回眸与探赜

林 彬

摘要: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范畴,与欧洲国家“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可追溯至“士”。古代知识分子不仅严谨治学,还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及可作表率的人格修养;近现代知识分子在用知识启蒙、积极治学的同时,主张“经世致用”介入政治,用鲜血和生命去改造旧世界;当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传承传统先进文化、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传导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传授教育知识等方面,发挥着引领风尚、更新理念、创新创造与“传承传导”的独特使命。

关键词: 知识分子; 发展路径; 治学; 治世; 探赜

中图分类号: C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11)04-0143-07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最初指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创新态度、具有前瞻意识和技能的人。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范畴,与欧洲国家“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可追溯至“士”。“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又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早在殷商西周时期,从事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多方面活动的“巫史”便可看作中国的第一代文化人;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士”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掌握了专门文化知识,不耕而食、不富而贵,成为或依附权贵、或自立门户的专职脑力劳动者;至唐宋时,随着社会格局的调整和科举制度的建立,“士”阶层逐渐打破了门阀制度的限制,得以选拔、举荐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巩固中央集权的得力助手。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士”阶层作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一支核心力量,担负着推进社会发展、文化繁荣、教育启蒙、政治开明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使命。中国近代意义上与欧美相类似的知识分子群体,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现代汉语词典》将知识分子界定为具有较高文

作者简介: 林彬,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从先秦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使命和所要走的道路,有一个自觉的、普遍的认识,虽然儒、道、墨、法等不同学说流派并存,但最终共同的目的都是要求参与社会政治实践,寻觅成为一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规范的发展路径。

一、辩证理解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发展路径

在中国知识分子涵义中不仅含有治学的应有之义,它还包孕强烈的社会关怀及可作表率的人格修养。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为人”,用孟子《告子》里的一段话来说明就是“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荀子在《劝学》里则解释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这里的“美其身”,就是“为己”,相当于孟子讲的“修天爵”,指人格的提升;而所谓的“为禽犊”,就是“为人”。可见,古代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极高,“内圣外王”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道德标准,“学而优则仕”也就成了其基本发展路径。

1、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志于道”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钱穆先生指出,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学问主要目的,正在明道行道”,道义担当、仁以为己任,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激浊扬清的巨大作用。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士志于道”就是要求“士人”视“道”有超越生命的价值,并具死而后已的求索精神。“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士志于道”就是要求“士人”不迷信权威,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士志于道”就是要求“士人”坚持道义,敢于向权势说“不”,决不“枉道”以从“势”;“士志于道”就是要求“士人”摆脱物欲的控制,“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孟子·万章上》)。可见“道”成为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成仁取义的精神力量,诚如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所言,愈是“天下无道”、“天崩地坼”,孔子的“士教”愈显出它的力量。从汉代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宋代的知识分子承五代之浇漓由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与抱负,到晚明顾亭林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林党人二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其中跃动的即是这“志于道”的“恒心”、“士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只是指人类的文化理想,也即是中国人之所谓道。宋代理学家张横渠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可见中国士人在历史上之大任务。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社会人群之所以为社会人群之理想,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格追求、共同精神与价值取向。

2、古代知识分子的治学路径。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孔子看来,人生的每个阶段应有一定的标尺,要学而不厌、加强修养、勇猛精进,洵为中国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孔子“有教无类”地广收学生并“因材施教”,形成“弟子三千”的规模。《论语·先进》提到孔子教学有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朱熹承继孔子为古代知识分子设定的治学路径而延伸提出了“格物致知穷理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学之道,明确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如何治学?如何使治学路径不偏离大统?宋代陆九渊认为“学者须先立志”“无志,则不能学”(《陆九渊集》),“学者贵卓然自立,尤贵奋发有为”(张百行《困学录集萃》)。学必求益,如果“学而为名,内(内心涵养)不足也”(杨时《论学篇》)。匡正治学路径,除了要端正学习动机,还须讲求学习的态度、方式和方法。治学要求刻苦虚心、锲而不舍,“发愤忘食,乐而忘忧”,“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温恭自虚,所受是极(所学到的才是其本原)”(《管子·弟子诫》),“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朱熹《学三论知行》)。西晋车胤“聚萤作囊”,西汉匡衡“凿壁借光”等勤奋攻读的掌故,可谓家喻户晓。治学要求善思多想、领会实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能反三隅(举一反三)者,得意而言(领会内容)”(嵇康《声无哀乐论》),“进学则在致知(领悟真知)”(《二程语录》),否则,“学而不化,非学也”(杨万里《庸言》)。治学要求广纳博取、精益求精,“博学切问,所以广知”(黄石公《素书》),“学者规模贵大,功夫贵密(严密、精细)”(陈栎《随录》)“善学者穷于一物,不善学者穷于物物(就事论事)”(庄元臣《叔苴子内编》)。治学要求循序渐进、力学不厌,“圣贤之学,非造次(匆忙)可成,须在积累”(朱熹《王岩叟语》),“日累月积,所蓄自富”(阮葵生《茶余客话》),“君子之学,死而后已”(顾炎武《人书云》)。

3、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治学宗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为个人精神修养的提升和知识分子发展价值取向,必须通过时下的每一件世俗生活来体现,治学不仅提高自身修养的境界,而且通过“治学”实现“治世”,进而实现自己参与“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因此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入世”精神、济世情怀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济世情怀一方面体现为“以天下为念”的博大心胸,“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万章上》),《大学》所总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框架正表明了士人决不能只以成己为限,而一定要发及于物,行道于天下,“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甚至“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另一方面体现为“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参与意识,孔子要求士大夫“忧道中忧贫,谋道不谋食”,认为“不仕无义,行义以达道”。孟子进一步展开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并进一步规定了士的用世道

路,“士之任也犹农之耕也”,用世志在“格君心之是非”。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到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从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顾宪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不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问题具有深切的责任感。这种将身家性命与天下视为一体、志道行道的士大夫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本色即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也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理想主义的自信与豪情。

二、客观了解近现代知识分子“治学治世”的发展路径

鸦片战争之后,神州陆沉、社稷丘墟、满目创痍,此时从黑暗中走出一批“生于忧患”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即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他们在用知识启蒙、积极治学的同时,主张“经世致用”介入政治,与当权派对抗,不管二者有何区别,这种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改造旧世界的大无畏精神是旷古罕有的,这就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治学治世”的走向找到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1、近代知识分子治学的境界。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知识分子治学的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句原是宋词里言情话相思的佳句,被王国维巧妙地运用了三句中蕴含的哲理意趣,用以表现“悬思——苦索——顿悟”的治学三重境界,赋予了它以深刻的内涵。他认为治学第一境界为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第二境界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潜心学术的同时,王国维首先提出治学的任务不是表现儒道,而是表现人生,认为知识分子“非孤立之生活”,其使命在“家族、国家、社会”中,把近代知识分子治学境界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2、近代知识分子治世的情怀。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一直流传到近代知识分子身上,所不同的是,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已经不是先前的儒释道,而是有更多从外界习来的理论进行治世。无论是魏源、郑观应等“洋务派”所秉持的“经世致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启蒙思想,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西方理念并以“中学补西学”,学习与政体相辅的政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并倡导民权;无论是崇奉“天赋人权说”,主张人的自由、平等、政治的民众化、权利的制衡、权力来自于人民的

严复,还是倡导民族、民权、民生等“三民主义”的孙中山,都有感于外国列强压迫、民族危机日重、人民生灵涂炭、政治制度腐败,产生强烈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治世情怀,从而将所学知识用于人民大众的“启蒙”,肩负起积极治世、救国图强的崇高使命。

3、“五四”知识分子救国图强的历史使命。新文化运动震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潜藏的对于国家、民族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他们积极投身到大变动的社会洪流中,追求真理,探索治国经邦的大道理、大精神,即一切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当是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繁荣。“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学贯中西,欲究中华兴亡之际,通古今中西之变,遂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带来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将民族兴亡、国家发展置于个人荣辱之上;鲁迅、郭沫若不满足于知识分子单纯治学的状态,毅然弃医从文参与社会政治实现“治世”理想。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一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所呵护的民主精神。通过思想和文化上摒弃禁锢人们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传统礼教的束缚,理性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道追求真理的动力。他们通过各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让思想在碰撞之间迸发出真理精神,他们尚自由、尚科学、尚平等,能够直面身处社会的大变动。在社会大变动时期,那些由平民供养而鄙夷平民阶层的贵族失去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的支持和信任,而关注平民生存境况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承接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道义,并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

三、全新析解当下知识分子“传承传导”的发展路径

从“五四”运动时期的启蒙主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精神,知识分子无不扮演着引领社会发展的精神导师的角色。我们认为,“士人”品格的当代转换在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精神建构方面仍有积极意义。当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传承传统文化精华、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传导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传授教育知识等方面,发挥着引领风尚、更新理念、创新创造与“传承传导”的独特使命。

1、要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传播倡导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越来越复杂化,人们在思想认识、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差异性日益突出,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和碰撞的局面越来越明显。当代知识分子要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作为自身崇高的历史使命,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唱响主旋律,使之化成为人民的自觉追求。一方面,要把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倡导与贯彻科学发展观相结合。知识分子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人们树立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恪守“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的价值追求和行

为准则,勇担责任、不辱使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另一方面,要把核心价值的传播倡导与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导向,以多元多样、健康有益的文化兼容共生、和谐相处为特征的思想文化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坚强的政治保障,又需要有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在构建和谐文化中,广大知识分子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通过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引导人们树立追求人类和平、社会关系融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再一方面,要把核心价值的传播倡导与实现包容性增长相结合。包容性增长的实质是追求平等、倡导协作,以促进共同发展,它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构建和谐社会为最终目的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决策。早在春秋时期诸子并起,著书立说,学派林立,广收门徒,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出现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景象,更创造了机会均等、各抒己见的自由宽松氛围。因此,当代知识分子更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有效引领社会思潮。差异是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尊重差异就是要尊重广大群众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的思想实际提出不同要求。多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核心价值体系能否发挥主导作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能不能包容和整合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思想意识。包容多样,就是要树立多样共生、和而不同的意识,不断扩大核心价值体系的包容度和影响力。知识分子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并不是随波逐流、无所作为,而是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关注社会思想变化,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腐朽文化的影响,引导社会思潮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2、要当好先进生产力的传播培育者。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学科之间相互联系渗透,产生了各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实现了科学知识的一体化,知识生产、知识成果的社会化。为此当代的知识分子不能固步自封,而应树立与时俱进的理念,紧跟时代发展,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推进科学技术的创新。一方面,要传递好科技创新的因子。科技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能力的象征。现代社会发展中一项新技术的运用,可能创造一个产业,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特征,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做科技创新的勇敢开拓者。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强调“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不同学科的融合,既包括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的融合,也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融合。知识分子要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破除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的门户之见,以更加宽容的态度鼓励学术的探索,以更大的力度支持学科的开拓,并使这种创新因子在社会不同层面能生根发芽。另一方面,传播培育好知识融合力与运用力。科技发展涉及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际组

织、中介服务机构、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包括人才、资金、科技基础、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创新氛围等多个要素,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作用下的一种复杂现象,也是一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钱学森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强调知识、技术和信息化的作用,特别强调知识集成、知识管理的作用。知识分子承担着科技创新的重要使命,就要把科学研究为先导的知识创新、标准化为轴心的技术创新和信息化为载体的管理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为实现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提供支持和保障。

3、要当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传播实践者。知识分子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的业师,更要做身传心教的育人智者,做先进知识的传授者。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不仅要具有深厚广阔丰富的人文素养,更要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用在学术研究方面,要求严格遵循知识的建构原则,将自己的价值首先定位于专业规范的界限之内,并以“专业良知”的通观能力、思辨能力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行为取向;用在业师实践方面,要求向学生传业的同时,铸造他们的独立精神和崇高品格。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承担起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切实做好人才工作,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是确立我国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知识分子大多数位于教学、科研和生产的第一线,具有个体相对独立性的特征,这就要求知识分子要加强集体主义价值观,努力打造创新团队,当好传帮带的领路人。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从事科研生产工作的知识分子要努力建设创新团队,给年轻人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将他们推向科研生产第一线,把各类人才培养造就的“接力棒”传递好。

从古代的“士”阶层所承担“经世致用”的使命,到近现代知识分子“治学治世”的路径,再到当代知识分子担当的“传承传导”的独特任务,知识分子是不断前行的。这就要求知识分子既能立足于专业,又可自由地跨出专业的边界,具有世界眼光;既要有战略性思维,具有敏锐、超前的见解,乐于引领时代潮流,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勇于启迪民众,推动社会进步,服务人类发展。

参考文献:

- [1] 雅斯贝斯(德)著 魏楚雄等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 [3] 钱穆《中国思想史六讲、中国学术思想十八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 [4]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
- [5]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6] 袁行霈《学问的气象》,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1月版。
- [7] 许明编《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
- [8] 姚国华《大学重建》,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
- [9] 胡银根《论大学教授的特征》,《现代大学教育》2003年第1期。
- [10] 杨东平《大学之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